

与妈妈合影

前些年,我读过一本书,是蒙古国作家达·哈丹巴特尔写的,书名叫做《写给妈妈的信》,真是一本令人爱不释手的书。我一口气把它读完,感动得眼泪打湿了书页。作者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,从小没了父亲,孤儿寡母,相依为命。由于家住乌兰巴托市郊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他和母亲照了很多合影照片。后来,母亲去世后,他每当思念母亲,就翻出过去的照片,回忆当时拍照片时的情景,一幕幕生动的故事就流淌了出来。一幅照片,就是一段故事,他就把它记录下来,以给母亲写信的方式回忆那段往事,终于写成了这部文字生动,感情真挚的书——《写给妈妈的信》。当时,我一边读这部书,一边非常羡慕他当时有条件与母亲拍合影照。

这些年,社会发展瞬息万变,手机迅速普及,手机档次一个比一个好,可以拍照,无论大人小孩,谁都可以随时随地拍。拍个合影照,简直是小菜一碟,不足挂齿。

无奈我生不逢时,我老家在哲里木盟(今通辽市)库伦旗北部偏僻闭塞的乡下,离旗所在地100多华里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去旗所在地,进照相馆里照相,就我们家的条件来说简直是可望不可即的事情。这是客观原因。但是,

也有主观原因。七十年代之后,我已经当了干部,虽然那时候个人购买照相机也是凤毛麟角,但是借台相机,也不是不可能的事,并且我领着母亲去过库伦,赤峰,大板等城镇,可怎么就没有进照相馆照张合影照呢?是因为妈妈拖着病体,我求医问药、东奔西跑,没有顾得上?纵然有一千个理由,现在看都不是理由。我一起便悔恨不已。不过,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,不管怎么说,我和妈妈在北京拍了一张合影照,成为我一生最珍贵的珍藏。

那是1969年夏天,我毕业分配到昭乌达盟(今赤峰市)巴林右旗工作不久。有一天,我收到大哥从老家来的一封信。信中告诉我,母亲患病。我向单位请假,急匆匆回到库伦旗老家,才知道妈妈患妇科病流血不止,身体很虚弱。可是,由于乡下妇女观念上的封建,患了妇科病,藏着掖着,小病拖成了大病。再说,乡下医生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,诊断不了。我就把母亲接到库伦旗医院做检查,诊断结果出来了,医生悄悄告诉我,你妈妈得的是不好的病,初步怀疑是子宫癌,赶紧去大医院吧。那个时候,天津“6·26”医疗队正在巴林右旗,医生中有很高明的专家、教授,考虑到可以就近治疗,我就把妈妈接

到巴林右旗。经天津“6·26”医疗队董教授检查诊断,库伦旗医院的诊断进一步得到了确认。董教授告诉我,医疗队设备和技术条件有限,她建议我去北京日坛医院,那是全国顶级肿瘤专科医院。我二话不说,立即领着母亲到了北京。在日坛医院检查的结果,是宫颈癌晚期,需要住院进行化疗,但当时床位很紧张,需要排队等候。

在等候病床的那些日子里,我和妈妈商量,来一趟北京不容易,想领上她逛逛街,起码到北海公园、颐和园等地方看看。但因为妈妈身体很虚弱,走不了那么远的路。最后,根据她的要求到天安门广场看了看。在她心目中,天安门就代表了北京。并在天安门广场照了一张合影,也算是完成了妈妈的夙愿。那么热的天,妈妈还穿着一身长袍。现在,我常常想,当时为什么不给妈妈买一身薄一点的夏装呢?也许是因为手头拮据的原



因?妈妈住院需要一笔钱,那时我刚参加工作,手头很紧。但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。如果是个女孩子,想得细,肯定能考虑到这个事情。而男孩粗心大意,没有想到这些细节。我现在都不能原谅自己,我亏欠妈妈的实在是太多了!

我和母亲的这张合影,是我俩第一张,也是最后一张合影。母亲从北京治病回来不到两年,还是被癌症夺去了生命。这张照片是我妈妈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,我们兄弟姐妹6个人中,我也算是最幸运的一个,和妈妈合了个影,其他人没有得到这个机会。所以,他们几个都将这张合影视为珍宝,珍藏在相册里或镶在相框里挂在墙上。 文/岱钦

蹬三轮车的老伯

我认识这位蹬三轮车老伯的时候他才40岁出头,可我是个小孩子,自然得这样称呼他。

这是1955年的事。当时父亲在内蒙古财政厅工作,经常出差。去火车站没有出租车可乘,都是雇一辆三轮车拉到车站的。

三轮车不同于电影《骆驼祥子》里的主人公那样,两手紧紧抓着两个车轮的“洋车”车轱辘,拉着顾客向前跑。而是车主骑在前面的车座上,蹬着像自行车一样的两个脚蹬子,拉着顾客前行,看上去比跑着拉“洋车”省劲,也进步得多了。

一次,父亲被派往海拉尔出差,那天傍晚父亲要去订一辆三轮车,我也跟着去了,来到呼和浩特市新城鼓楼西北角靠马路的空地上,只见许多三轮车的车主坐在车上,依次排成队等候人们来雇用。父亲来到最前头的一辆,车主立马下了车子问:“您好同志,去哪?”父亲说:“我现在不用,我是来订车的,明天凌晨4点钟,您能准时到西落凤街9号门口,拉上我去火车站吗?”车主说:“好好,没问题。您先付给我一半的乘车费,两毛钱。”就在父亲付车费的时候,我注意到,这位车主老伯身体很壮,浓眉大眼很慈祥。通过父亲和他的简短交谈,我知道老伯姓刘,住在鼓楼东街。碰巧他的儿子也在呼和浩特市苏虎街小学读四年级,而且还和我同班,名叫刘玉。老伯摸着我的头笑着说:“你的学习一定不错吧?好好帮一帮我那小子。”

回家的路上我对父亲说:“你先给他一半的钱,万一明天他不来怎么办?”父亲有些生气地说:“看你想到哪儿去了,人家是那样的人吗?”接着又叮嘱我说:“以后和他的孩子好好团结,不能因为他是蹬三轮车的,就瞧不起人家。”我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果然,翌日凌晨4点钟院门外传来了老伯的喊声:“三轮车来了——”已经吃完早点的父亲立即扛着捆好的行李,母亲帮着拿其他的東西,看着父亲上了三轮车走了。

从那以后,我和刘玉成了好朋友,起初他晓得我知道他爸爸是拉三轮车的,还有些难为情,见我对他很热情就变得开朗了,领我去他家玩,多数时间见不到老伯,偶尔见到,老伯对我很亲热,拿出稀罕的食品让我俩分享。父亲在以后出差的日子里,只要是订第二天凌晨的三轮车,就让我把准确的时间告诉刘玉,由他再转告老伯,老伯都按时来到家门口,从没有失误过。有时老伯不收父亲的车费,父亲觉得对方养家很不容易,从来都是如数付钱,有几回本来应付4角钱,父亲给了5角,告诉老伯不用找了就匆匆进站房了。

临到小学毕业时,老师让我们写作文,题目是“我的爸爸”或者“我的妈妈”。刘玉的作文写得真实,老师当做范文念给全班听,他写道:“爸爸是蹬三轮车的,没有多少文化,心眼却特别好。有一回天气比较冷,爸爸没戴手套蹬着车子送一位叔叔到了火车站,叔叔下了车子付给爸爸钱着急就走了,爸爸发现了他落在车座上的一副毛线手套,立刻喊住叔叔送到了他的手里。还有一次,爸爸蹬着空车往回走,看见有个老爷爷拄着双拐很艰难地走着,于是就把老爷爷扶上车子送他到了家。到了老爷爷家才知道,老爷爷是个孤寡老人,爸爸没要他一分钱。我家5口人,奶奶爸妈还有姐姐和我,主要靠爸爸蹬三轮车养家,妈妈给药厂糊药盒(那时候的药丸子都是用手糊成的纸盒包装的),生活很不宽裕,但是爸爸从来都不贪便宜,教育我和姐姐好好做人。我很爱我的爸爸和妈妈。”

刘玉的作文朴实感人,这是老伯品德高尚为人正直的真实写照。老师念完后教室里爆发出一阵热烈掌声。

小学毕业后,我和刘玉考进了不同的中学,不久我家搬到了给直属机关职工的家属盖起的宿舍,距离远了,与老伯家的来往就很少了。

现如今在街面上偶尔还能看到拉货的平板三轮车,至于拉乘客的三轮车早已销声匿迹了,出租车随处可见,类似三轮车那样落后的交通工具,只能到记忆中去寻找了。 文/张锡范

养鸡

奶奶爱养鸡,最多的时候养过18只,那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事了。

鸡窝搭在院子里靠西墙的地方,有牛圈的一半高,土坯垒墙,上搭木椽,泥顶子。窝里架一些木条、木棍,把窝分成3层,上两层是落鸡的架,靠地的一层清理鸡粪。黄昏时分鸡上了窝,可容20多只鸡住宿。早上一开鸡窝的栅门,鸡们就争抢着飞出。奶奶把煮好鸡食的大铁盆端出家门,它们就争抢着吃。

鸡食比猪食精细,一般是麸皮、谷糠、菜叶等。鸡吃的时候,奶奶就让我拿拨火棍看着,防止猪抢着吃,一天两顿。其他时间,鸡们就在院外草

堆粪堆等处觅食活动休息,或者在沙土里翻身抖翅进行沙浴。

奶奶对鸡感情深厚,对有外貌特点的鸡,她都有称代的叫法:大黄鸡、小黑鸡、毛腿腿、印花花……最大的一只红公鸡,是当时最好的一个品种,其他人没有,更是奶奶的宝贝。鸡多了,鸡蛋自然也多,平时舍不得吃,积攒多了卖钱,或者换针头线脑、火柴、煤油等。每年羊角葱长到二三寸高的时候,全家才炒着吃一次,至今成为我和弟弟妹妹们的美好记忆。

说起养鸡,有一件事不能不提。我们陶卜齐是个大村子,西90里是归绥市(今呼和浩特),西8里是陶卜齐

火车站(实际在今呼和浩特榆林镇),东30里是旗下营,村东、北、南三面环山,村南有大黑河,京包铁路从村中间穿过,是商旅兵家东西走动的必经之地。

1945年8月,抗日战争结束,日本鬼子要撤退,所乘的铁甲车开到我们村时,因村东二道河山洞到旗下营段的几节铁轨被八路军拔掉了,撤不成,鬼子就下车进了我们村。

那年我7岁,一天中午,大人们刚从地里回来,院子里突然闯进七八个鬼子兵,牵两匹马。先是让大人给遛马,不知我叔叔嘟囔了一句什么,话音没落就挨了一枪托……他们看到院里有鸡,就哇哩哇啦

吼起来,用手比划着,让人给他们逮鸡。首先看中的是我们家的大红公鸡,追鸡的过程中,几十只鸡翻墙过院上房顶,乱飞乱叫。忽然,我家的大红公鸡不见了,像被魔术师变没了一样。鬼子气急败坏乱嚷嚷,用枪刺在地上乱画,意思是我们把鸡藏起来了。这时候,消息传来,铁甲车能开了,鬼子才拉马仓皇撤走。我们家那只大公鸡呢?原来是跑到隔壁四奶奶家灶台下放拨火棍的窑里去了。四奶奶烧水,屁股底下垫着一个麦草片子,鸡钻进进去后,她顺手把麦草片立了起来,屋里水雾大,进到她的家鬼子愣是没发现。 文/禹子清